

究方法上是開放式的。正如陳鼓應所評價：

《莊子學史》中獨到的眼光和深刻的論述，不僅得益於方勇教授深厚而扎實的文獻功底，也離不開他兼容並蓄的研究方法。作為研究古代學術史的專著，方教授所著的《莊子學史》在運用傳統的訓詁、知人論世、史論結合等方法的基礎上，還積極

採用了西方闡釋學和文本細讀的研究手段，體現出著者很好的專業素養和正規訓練。（〈序〉，第一冊，頁10）

千載莊學如展鵬，一任志者逍遙遊。方勇《莊子學史》無論在規模的宏闊與浩瀚方面，還是在學術的精深與通透方面，都真正把握了莊子以及莊子學的思想精髓。

邊疆的複調

● 袁 劍



薩義德 (Edward W. Said) 著，王宇根譯：《東方學》（北京：三聯書店，2007）。

筆者在讀大學中文系本科時，第一次接觸到了薩義德 (Edward W. Said) 的《東方學》(Orientalism)，當時的視角主要是偏向於文學的後現代眼光。後負笈北上，研讀邊疆歷史，期間亦再讀過本書，遂生出些許邊疆視角的新觀念。研究生學畢，前赴德國深造，深處古典哲學母國的深厚傳統之中，此番對《東方學》的重讀，亦為邊疆觀的複調，是以成文。

在動物世界中，一方必須通過對另一方的確認來反證自身的存在，人類亦如此；而此種對「他者」的確認以反證「本我」的過程，亦在地理角度深有體現。薩義德在《東方學》(引用只註頁碼)的再版序言中指出，「我相應地強調無論是『東方』這一用語，還是『西方』這一

作為內／外的典型西方二元觀在現代國家形態中仍根深蒂固地有所展現。觀乎國家內部之政策思維，往往存在着這一種「自我東方化」的趨向，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則表現為一種話語權力的在地新分配。

「東方學」作為一種指向不明的名稱，就如一個東方學家，往往把亞洲與北非的文化理所當然地視為應當關注的對象，但是，在事實上，他往往毫無專長，成為一個空洞的所謂營構「大體系」的大人物。

概念都不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穩定性，二者都由人為努力所構成，部分地在確認對方，部分地在認同對方。」(序言，頁3)一本書本身或許並不重要，關鍵是我們如何去理解它；與此同理，薩義德所提出的「東方學」本身或許有其原初意義，但問題在於我們尋找到合適的切入點。

然而，作為內 (inside) / 外 (outside) 的典型西方二元觀在現代國家形態中仍根深蒂固地有所展現。觀乎國家內部之政策思維，往往存在着這一種「自我東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 的趨向，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則表現為一種話語權力的在地新分配。薩義德在書中曾雄心勃勃地認為，「弱者完全能夠表述自己，二十世紀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頁431)。這種馬克思式的革命樂觀情緒實際上忽略了複雜的社會因素對這種表述無時無刻的壓制，在這裏，老大哥 (Big Brother) 化為空氣中的無形壓力，擠壓着那些弱者及其試圖表現出來的情緒及意識。

「東方學」作為一種指向不明的名稱，在囊括眾多領域的同時亦消解了其自身的穩定性，這種學術話語如當初共產國際的東方局一樣充斥着囂張及壓制；又如一個東方學家，在這樣的一種身份下，往往把亞洲與北非的文化理所當然地視為應當關注的對象，但是，在事實上，他往往毫無專長，成為一個空洞的所謂營構「大體系」的大人物。

縱使我們有再多的幻想，仍然無法改變學術不能自存這一事實本身，學科 (discipline) 的劃分從一開始就是對政治劃分的映射，而在政

治新變動發生之後，在邏輯上則要重新對學科加以整頓，在這種條件下：

東方學不只是一個在文化、學術或研究機構中所被動反映出來的政治性物件或領域；不是有關東方的文本的龐雜集合；不是對某些試圖顛覆「東方」世界的邪惡的「西方」帝國主義陰謀的表述和表達。它是地域政治意向向美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文本的一種分配；它不僅是對基本的地域劃分 (世界由東方和西方兩大不平等的部分組成)，而且是對整個「利益」體系的一種精心謀劃——它通過學術發現、語言重構、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會描述將這些利益體系創造出來，並且使其得以維持下去。(頁16)

學科成為形塑政治力量的邊疆與非邊疆區域的共謀。

德國政治地理學家拉策爾 (Friedrich Ratzel) 曾將邊疆 (die Grenze) 視作邊緣有機體，更廣義地看，一方面，邊疆是一種有形的地理分界，成為帝國的外部邊界，在這一邊界內部，帝國具有無可挑戰的話語權，「每一個帝國在其官方論述中都說自己是與眾不同的，它面臨的情況是特殊的，它肩負啟蒙開化、帶來秩序和民主的使命，並且它是不得已才訴諸武力」(序言，頁3)；以「自我」論證「自我」，邊疆往往只是外族所在的「四裔」。在另一方面，邊疆又是一種活着的存在 (Dasein)，處於一種無時不在的野蠻化與神秘化過程中，成為遠方謎一樣的「他者」。在帝國的這種傲慢

氛圍中，邊疆成為一種典型的東方學物件，並在這種學問中以特殊的方式生長，在這裏，人們將「在探險、傳教、軍事和商業活動中零零星星地搜集起來的一大堆碎片重新轉換、重新結構為字典編纂式的、圖書館式的、部門化了的以及文本化了的東方學意義」（頁214）。

作者指出，美國的東方學研究經歷了一個全局性的轉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的東方知識一直停留在歐洲所曾經歷過的，發源於語言學研究的以修飾、編織和重構為特徵的階段，當時的美國人正忙於開拓自己的西部邊疆而無暇顧及萬里之遙的邊疆之地——東方；而在二戰之後，美國的國內邊疆開發完畢，遂轉向之前忽視的「東方」邊疆，並在此後的過程中通過政治、經濟及資訊媒體的軟建設，將這種東方邊緣意識固化了下來。美國的這種邊疆學派競流、邊疆類型多樣且層層推進式的「邊疆活動」，成為導引由歐陸東方學傳統發展而來的地區研究的不竭動力。如今，主導的東方學研究方式已經從歐洲的漢學研究範式轉向美國的區域研究範式（以地區加以劃分），這也標誌着歐洲一直存在的對整體性的東方特徵的探索嘗試趨於式微。

有形的邊疆何在？作者在書中說：「如果沒有空想家們將廣袤的地理區域轉變為可處理、可操縱的實體這一技巧，『歐洲』或『亞洲』就甚麼也不是。因此，歸根結蒂，歐洲和亞洲是我們的歐洲和我們的亞洲——如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所言，我們的願望和表象。」（頁150）從歷史上看，歐洲民眾對於歐洲確實存在着一種相對一致的歐洲認

同，而亞洲則全無這一「亞洲認同」，西亞、南亞和東亞之間的差異使得將整個亞洲視作真正文化整體的努力永無可能實現。如此一來，則東、西方兩者的內在邊界已明，於是「知識不再要求應用於現實；知識是不加評論地從一個文本默默轉向另一個文本的東西。觀念得到千篇一律的宣揚和傳播，毫無創新地被重複；它們地地道道地成了『陳詞濫調』：重要的不是觀念本身，而是它們存在，被毫無創意地重複、回應和再回應這一事實。」（頁151）通過在文學、藝術、行政上的文本創作與管理實踐，形塑了東方內部與西方內部的朝聖之旅，並從而清晰凸顯出兩者之間的有形邊疆。

邊疆又如何是活着的？「歷史規律實際上是歷史學家的規律」（頁150），歷史學家不是死去的朽木，其所指出的歷史規律亦往往因時而變。在歷史學者的移情（Einfühlung）態度下，他們往往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進入另一個文化氛圍之中，並試圖以自己的角度來加以檢視，以拓展自身文化的對外影響力。「在許多思想家中間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勢：通過內在認同（sympathetic identification）超越比較研究，超越其『從中國到秘魯』式的全面洞察……十八世紀的人們可以穿破高聳於西方和伊斯蘭之間的教條壁壘，發現自身和東方之間潛含的親和性。拿破崙是這一（通常是有選擇的）內在認同的著名例證」（頁153）這種現象與如今的歐洲聯盟內部的人員、貨物及服務業自由流通大相逕庭，兩者都存在着現實的國家邊界和邊疆地區，但是這種存在卻以不同的形式展現。

如今，主導的東方學研究方式已經從歐洲的漢學研究範式轉向美國的區域研究範式（以地區加以劃分），這也標誌着歐洲一直存在的對整體性的東方特徵的探索嘗試趨於式微。

薩義德或許沒有預料
到，在他身後，學者
對東方學命題的地方
性思考一方面背離了
他對整體性的東方學
的期許，但在另一方
面卻使東方學成為一
個在歐洲之外繼續生
長的學問。

當筆者輾轉於弗萊堡、斯特拉斯堡以及巴黎時，在某種程度上，跨越國境的感覺甚至還沒有在中國國內越省的感覺，但是，在此地是兩個國家，在中國則只是兩個省，邊疆還是邊疆，筆者深有感觸的是，在跨過萊茵河的一剎那，兩端的文字標牌全都變成自己國家的語言，這就是邊疆，這在筆者的腦子中深深植根！由此反觀薩義德的論述，他毋寧是在說，在通透的比較研究之中，我們方能深刻感受到各方彼此間深刻的差異性、民族性以及邊疆性。活着的邊疆還存在於時空分布的不均勻性之中，可以這麼說，一國之內時空分布的密集區域形成了這個國家的核心地帶，而最密集區域則往往是首都或經濟中心城市之所在；而一國之內時空分布的稀疏區域則成為該國的邊疆地區，類似於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所稱的邊緣地帶，只有在這種有梯度的時空背景中，邊疆方才凸顯出其意義所在。東方學研究若成為類似於英語國家的英語文學研究那樣的顯學，則它就不再具有薩義德所稱的「東方學」的意義，東方學必須處在邊緣與試圖走向中心的矛盾境地中，這樣的東方學才是活的，其所指稱的邊疆也才是活的。

我們總是在追問學科的意義，這是每一學科最怕回答的問題。東方學的意義何在？它僅僅是自娛自樂還是意有所指？薩義德沒有直接回答這一問題，他毋寧是將這個問題存疑，而先去表述學科本身。但是，作為一個東方人、中國人，在述及這一問題時，還是經常會先驗性地將之納入本國範圍之內，去尋求其在確定的中國語境下的意義。

作者與讀者的意義指向產生了分疏，而這種分疏卻構成了東方學新的成長點。愈是民族的，才愈是世界的，薩義德本身或許沒有預料到，在他身後，學者對東方學命題的地方性思考一方面背離了他對整體性的東方學的期許，但在另一方面卻使東方學成為一個在歐洲之外繼續生長的學問。

「東方的東方學」(the Orientalism of the Orientals) 儘管還是使用了「東方」這一被西方所定義的詞彙，具有某種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所謂的「晚期托勒密」色彩 (安德森著，吳叡人譯：〈導論〉，載《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3)，但還是在努力確立自己的本身話語，表現在中國語境中，柯文 (Paul A. Cohen) 的《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一書所確立的「中國中心觀歷史」(China-centered history) 成為探尋「中國的東方學」的先驅之作。在此書中，中國歷史自己定義了自身的邊疆，西方不再是對中國歷史範疇加以限定的裁判者。

順着薩義德批評《劍橋伊斯蘭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是對東方學正統觀念的系統總結。說這一出自無數名家之手的著作在學術上按任何東方學之外的標準而言都是一種失敗，也就是說它完全可能以另外一種樣子出現，理應比現在做得更好」(頁387) 的思路，我們對於世所稱道的《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也

可以作如是觀：我們似乎過於局限於這些學者所劃定的中國歷史邊疆之中，而喪失了自己確定自身歷史邊疆的能力。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等前輩學人所提出的「衝擊—回應」模式儘管在社會政治歷史中已經顯得過時，但在有形與無形的歷史邊疆的形塑中卻依舊滿富價值，中國尋求「近代化」的過程也同時是確立其自身新的有形與無形邊疆的過程：傳統的夷狄觀念、宗藩體制被近代化的國界劃定、外交體制所取代；「中國」的名稱也重新獲得了意義，不再是「中央之國」，而是China，一個確定的並無多大聯想意義的國名；人們對一朝的認識開始轉向為

對一國的認識；天下興亡轉變為國之興亡；忠君轉變為愛國；王朝史開始轉變為國史。

這些跨越傳統意識邊界的新觀念重新在舊的機體上塑造起在一個新的世界格局下的新整體，並進而在這種普世概念(如近代國家邊界、外交關係)的範圍內重新定義自己的邊疆與非邊疆，這樣，我們才能發現原來四周並不是冷冰冰的水泥鐵絲網，而是有形或無形的國家邊疆，它是活的，且給人以溫暖，其中生發着這個國家的全部歷史。筆者相信，薩義德會理解這種對複雜邊疆的理解，他面對的是他的祖國巴勒斯坦，而筆者則面對着中華故國。

農民認知與農地制度可信度

● 周祖文



何·皮特(Peter Ho)著，林韻然譯：
《誰是中國土地的擁有者？——
制度變遷、產權和社會衝突》(北
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誰是中國土地的擁有者？」這
是何·皮特(Peter Ho)一本近著
的中譯本書名。這一問題來得突
兀，恰似當頭棒喝，一時還真不
易作答。其實何·皮特原書名《變
遷中的制度：中國農地所有權、
財產權與社會衝突》(*Institutions in
Transition: Land Ownership, Property
Rights, and Social Conflict in China*)

何著四平八穩的外表裏面潛藏着諸多尖銳而不容迴避的問題。農村土地的所有權是此書的核心問題。與這一問題相關，有兩個概念必須先予以討論：一是「制度的可信度」；二是「空制度」。